

「大公國際論壇——中日關係與亞太安全」召開 聚焦地區形勢 助大國外交

「大公國際論壇——中日關係與亞太安全」研討會議於10月28日假座香港北海海逸酒店舉行。來自中、韓等國的專家學者及媒體代表共聚一堂，對中日關係及亞太安全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文：大公報記者 張佳晴 張藝融 圖：麥潤田 林少權



▲「大公國際論壇——中日關係與亞太安全」與會者合影



▲論壇會場



▲大公報社長姜在忠（右）同與會者互動

本次論壇由香港大公報社主辦，大公國際傳媒學院承辦，以「中日關係與亞太安全」為主題，不僅就如何打破中日關係僵局進行了交流，更為中國亞太外交的運作提出了新的思路。

以史為鑒化解中日僵局

會議由大公報副總編輯、大公國際傳媒學院副院長徐荷與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李焯輝主持，徐荷女士對各位嘉賓的參與表示了歡迎與感謝，大公報董事長、社長、大公國際傳媒學院院長姜在忠致開幕辭。

姜社長在致辭中指出，近年來中日關係陷入僵局，不僅令人心寒，又讓人痛心。「心寒」在於，中日關係陷入僵局，在可預見的未來，難尋破解良方。「心痛」在於，中日曾經有過睦鄰友好的蜜月期。中方為改善中日關係作出了巨大努力，多次敦促日方以史為鑒，多做有利於兩國友好和地區穩定的事。但安倍內閣不僅不思悔改，反而變本加厲地推行右翼政策，致使中日關係錯失一次又一次轉機。姜社長表示，中日互為鄰邦，這是不可迴避的地理現實。兩國同為地區大國，關係的好壞將直接影響到東北亞安全和亞太地區的穩定，這也是不可改變的地緣政治現實。他說：「我們雖未經歷過抗戰，但從老一輩人的口述及參觀紀念館、博物館，我們也能切身感受到戰爭的殘酷。以史為鑒，就是不要讓戰爭的悲劇再次發生。」

大公報與日本淵源深厚。新記大公報「三駕馬車」——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均有留學日本的背景。作為在抗戰期間高舉輿論大旗的大公報，曾以筆作槍，與國人共赴國難；其當年刊登的眾多報道



▲會議由大公報副總編輯、大公國際傳媒學院副院長徐荷主持

與社評，至今仍令人熱血沸騰、心潮澎湃。

秉承「大公」築傳播平台

姜社長說，作為本次論壇的主辦方，大公傳媒學院秉承「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的辦報理念，旨在搭建海內外政府與傳媒、企業與傳媒、傳媒與傳媒間溝通交流的平台，培育傳播人才，引領傳播文化、提升政府、企業、傳媒的影響力。今天我們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研究國際問題，是大公傳媒國際學院提高站位，拓寬工作領域的一次有益嘗試。

隨後，各位專家學者在會上就「中日關係該如何破局」、「中美俄關係與亞太安全形勢」、「亞太安全的出路：大國協調下的危機管控」、「中國的亞太政策（TPP及南海問題）」等題目做了深入的研討與交流，為探討中日關係發展前景及助力亞太地區交流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契機與平台。

出席論壇並發言的嘉賓還有：大公報副總編輯、大公國際傳媒學院講座教授李慶義，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青年報》原社長陳小川，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前秘書長、前韓國駐港總領事石東演，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研究員徐堅，清華大學歐亞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吳大輝，香港中文大學國際事務研究中心聯席主任沈旭暉，中國國際關係促進會副會長兼學術研究組主任黃天，香港資深傳媒人、超訊國際傳媒集團有限公司總編輯紀頌鳴，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黃偉國，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理、M&C Corporate Consulting 執行董事許植，香港大學歷史系博士生李德江，香港大學歷史系博士生陳宏瑞等。

紀頌鳴：與華合作才是日本出路



香港資深傳媒人、超訊國際傳媒集團有限公司總編輯紀頌鳴指出，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積極推動新安保法案，並借聯合國大會的機會刷存在感，希望確立日本的「正常國家」地位。然而，日本的國際出路卻受制於美國，因日本的軍事與外交主導權並不掌握在首相府，而是被華盛頓所控制。關鍵問題是中日雙方要如何面對一個共同崛起的事實，在一個國際規則認可的角度下實現雙方的和平崛起，而日本只有與中國合作才能找到國際出路。

李焯輝：沒有TPP也不用着急



香港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李焯輝圍繞「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發表演說，他強調，中國目前對是否加入TPP持開放態度，但就算不加入這個美國主導的TPP，不玩美國人定下的遊戲規則，中國還是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中國也在與其他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比如澳洲、新西蘭、瑞士和韓國都有相關協議，目前跟日本及歐洲都有合作意向；另外還有「一帶一路」經濟合作概念。

陳小川：日民族民粹主義齊「發病」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青年報》原社長陳小川表示，中日各有70%以上的民衆認為兩國關係重要，但兩國都有約8成的人表示不喜歡對方，公衆的情緒很大程度上是由媒體引導。中日為什麼走出蜜月期，是因為中國近30年來發展太快，令日方嚴重不適應，而日本媒體市場化對於公衆情緒的消費，則助長了其公衆對於中國的消極反應。此外，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同時「發病」導致了日本的狹隘與不自信，其所謂的「安倍經濟學」亦並未見效。而在這種情況下，中日關係會長期互鬥，但同時也會互相克制。

徐堅：善用中美俄戰略三角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研究員徐堅認為，中美俄關係依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戰略三角，對世界形勢具有全局影響，而善用中美俄戰略三角有利於中方在亞太安全問題上爭取主動。誤用中美俄三角，可能對中方安全戰略帶來災難性後果。最後，在亞太安全問題上用好用中美俄三角的正確途徑，是堅持目前的方針，即同時與美俄雙方保持積極關係，在深化中俄高水平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同時，繼續大力推動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沈旭暉：港須發揮主動戰略價值



香港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就「國家亞太戰略下的香港」發表了講話，沈旭暉指，香港目前沒有亞投行創始成員的身份、沒有被「納入」海上絲綢之路的航海圖上等優勢，要發揮自身作用，就必須利用特別行政區的主動戰略價值。目前中國需要能取信區域國家的「中介人」，需要能同時掌握中西話語的「媒介」。而香港則可以利用目前在基礎建設、制度、語言和文化等短期的優勢，「採購」亞太地區的硬實力，「宣傳」國家的軟實力，維持及調控軟硬實力的「出口平衡」。

黃天：中國對釣魚島主權自古有之



中國國情研究促進會副會長兼學術研究組主任、中日關係問題專家黃天指出：史料顯示，早在釣魚島1968年發現石油之前，中國就有提出對該島的主權的記錄。成書於16世紀中葉的《順風相送》中，已有關於釣魚島的記述；末代琉球王的侍從秘書亦在其著書中描述歸入清國，而中國則從無吞併琉球國土的野心。

石東演：中韓關係與韓美同盟同等重要



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前秘書長、前韓國駐港總領事石東演則通過閱兵式和首腦會談透視大國外交與亞太安全。他表示，9月3日，韓國總統朴槿惠站在天安門城樓上，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及俄羅斯總統普京並肩觀看了中國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式。朴槿惠總統深知增進同中國的戰略友好夥伴關係與建立韓美同盟關係同等重要，原因有以下三點：一，中韓都是日本侵略與殖民主義的受害者。二，對於日本政府右傾化及歷史修正主義，中韓持相同觀點。三，中韓關係今年在各領域都取得飛速發展，特別是經貿方面。

吳大輝：大國協調下的危機管控



清華大學國際關係教授、博士生導師吳大輝指出，我們講「亞太安全」其實就是因為「亞太並不安全」。亞太地區是冷戰殘餘最集中的地區；是大國利益最集中的地區；也是最有可能發生大國軍事碰撞的地區；還是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的核心競爭區。在亂局之下，亞太地區需要新的集體安全體系，首先要建立中俄美三邊參與的大國協調機制，進行危機管控；協調各國背後的盟友；適當將東盟論壇及六方會談各方納入其中；再建立類似於歐安組織的機構。

李慶義：運作大國關係形成國際牽制



對於當前中日關係的僵局，《大公報》副總編輯、國際問題研究專家李慶義總結了四點結論，首先，日本現行政策是歷史的延續。其次，21世紀以來中日關係總體上處於一種下行的趨勢，而責任完全在日本。第三，中日矛盾是結構性矛盾，兩國關係明顯帶有對抗性。第四，中日對抗具有長期性。中日關係的對抗性、長期性決定了單純從雙邊關係入手，不可能打破僵局。因此運作大國關係，對日本未來政策走向形成強大國際牽制成為破解僵局的關鍵。與此同時，在「新常态」下，須繼續對日進行有禮、有力、有節的鬥爭，並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

黃偉國：中國應承擔更大國際責任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黃偉國指出：日、韓、美、中等國民調顯示，受訪者普遍看漲中國未來10年在亞洲地區的影響力，中國亦應在國際問題上承擔更大的責任。一些民衆認為中日關係的不穩定會造成亞洲地區的衝突；另一些受訪者則指出美國應減少對亞洲問題的干涉。

許植：中美博弈的平衡點



香港中文大學未來研究所副主理許植認為，中美綜合國力在歷史上最接近的一點，很有可能是2009年11月奧巴馬孤身訪華之時，在那之後雙方實力重新拉開。今天中國的國力可能是現代化革命及改革以來最高的一點，但再往下走，如果對外開放的勢力，我們的潛力和內在動力還有多少？之前我們花的資源，所建立的外交成果究竟如何評價和分析，甚至執行，都是很關鍵的。中國前面的路，不會因為我們的綜合國力達到現在的位置，而走得更順或者更加簡單。

李德江：中日輿論戰燒到澳洲



香港大學歷史系博士生李德江指出，在2012年9月日本提出所謂釣魚島「國有化」之後，中國與日本都想去引導西方輿論，就爆發了所謂的「甲午輿論戰」。這場輿論戰其中一個戰場就是澳洲。中國利用在澳洲的「宣傳反饋機制」，將「主旋律」的內容「出口」到澳洲媒體，再把澳洲的報道「轉內銷」，讓國內民衆了解到「中國之聲」的重要國際地位，最後「中國之聲」再回到澳洲媒體，以影響澳洲外交政策的決定。

陳宏瑞：邊境問題關乎中印友好



香港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陳宏瑞就中印外交關係發表講話，他從中印50年的外交關係、中印長期的邊境爭議及中印政府官員近期的討論會，三方面進行討論。他認為，中印近期官方交流頻繁，這些會議可以起到預防衝突的作用。因此，從1967年以來沒有嚴重的邊境事故。如果繼續使用這個方法，中國和印度肯定能將邊境問題妥善解決，恢復五十年代的友好關係。不過，印度應該首先停止保留「討論」跟「談判」的區別。